

角力上海：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及其原因探析

朱佩禧

内容提要 伪中央储备银行（以下简称中储行）是汪精卫为代表的傀儡政府的中央银行。其成立过程一波三折，反映了汪伪政府、日本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三方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日本政府在其成立前期持消极态度，后在汪伪政府一再的请求下，转而积极扶植中储行。另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则极力阻止中储行的成立。本文通过分析抗战时期三方在上海金融市场上的矛盾关系和斗争过程，来考察中储行成立的原因。

关键词 中央储备银行 中储券 法币 军用票

朱佩禧，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200438

近代以来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汇聚了各种金融势力，抗战初期由于“孤岛繁荣”现象的出现，金融市场上更是游资涌动。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力图通过套取外汇，压低法币币值来打击西迁抗战的重庆国民政府，对此，重庆国民政府不断抛售外汇，极力维持法币币值，开始了日本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双方的货币争夺战。1941年1月6日，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行在南京成立，财政部长周佛海任总裁。1月20日，中储行上海分行成立，随后，3月4日先在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中推行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进而在日军华中占领区（本文的华中地区指江浙皖、上海和南京地区）通过中储券全面驱逐法币，进一步打击重庆国民政府，由此，拉开了日本政府、汪伪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三方经济战的序幕^[1]。

对于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从日本政府或重庆国民政府的角度来分析其成立原因。这种对我方面的矛盾斗争的偏重弱化了汪伪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致使汪伪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的金融斗争被忽略。本文立足于汪伪政府、日本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的三方复杂关系，利用上海档案馆新近公开的政府档案资料，补充说明汪伪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梳理中储行成立过程的基础上进而分析中储行成立原因。

抗日战争进入持久阶段之后，经济实力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因此三方政府都采取了削弱敌方经济力量以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策略。日本政府在1938年7月12日的五相会议上，制定了推翻蒋介石国民政府统治的《伴随时局的对华策略》要纲^[2]，其中尤为重视采用套取可兑换外汇的法币来攫取军用物资这一遏制蒋介石政府的策略。退居重庆的国民政府为了维持法币的信用，通过获取英美列强的财政援助，粉碎日本试图摧毁中国抗战能力的阴谋。因此，针对日本政府在外汇市场和货币领域的挑战，重庆国民政府采取了设法保证法币在外汇市场上币值的稳定来抗击日本及其伪政权发行的货币的冲击。其中，汪伪政府为确立政府的统治权威，向日本提出成立中央银行的要求，力图通过发行新货币来达到统一币制、驱逐法币的目的，进而消除重庆国民政府在华中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但是，汪伪政府如果发行新货币，必然对已经出现的日系货币（包括军用票、华北联银券）等产生冲击，特别是日本军部发行的军用票在中华华南地区流通很广，日本政府不愿利益受损，一开始并不愿扶植中储行的成立，但是随着和重庆国民政府经济战的深入，日本需要傀儡政府发挥新作用，如发行新货币来收兑法币，因此转而积极支持中储行的成立。

一、日本政府对中储行成立态度的转变

日本对于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态度上有个转变过程，从初期不愿承诺的消极态度到口头同意，最后是极力支持中储行成立和发行中储券。这一变化反映了形势变化和日本政府的矛盾心理。“日本的忧虑毕竟是明天的早餐，而中国的担心则是今天的

晚餐。”^[3]日本考虑的是将来再次发生战争，中国担忧的是中日战争不会停止。双方不同国家利益的立场决定了对战争不同的看法。

即将成立的汪伪政府需要日本政府在财政金融上给予强力援助，所以要求日本在条款上给予明确承诺。作为傀儡政权的汪伪政府，虽然打着“和平救国”的旗号欺骗民心，但对外得不到英美列强的外交承认，对内在政治号召力上又远不及重庆国民政府。处于孤立局面的汪伪政府为了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急需解决财政问题。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起着巩固其在华中统治的重要作用，而成立中储行又离不开日本的支持，所以汪精卫等人人在与日本政府的谈判中不得不提出成立“中央银行”的相关条款和细节，希望得到日本政府财政金融援助的承诺。

条约上的分歧实际是双方利益偏差的表现，这是汪伪政府设立中央银行的主要障碍—日本出于自身权益的考虑，不同意立即成立中央银行。首先，日本政府不愿将华兴银行之外汇交回。其次，日本在华军部和大藏省都反对汪伪政权发行新货币，理由是“新货币必然对军用票流通造成冲击。况且，在富庶的江浙皖和上海地区交织着复杂的利益网络（英美金融影响和重庆国民政府法币的威力、日本财阀利益等），日本政府不愿得罪英美政府和日本经济界，所以在处置上海金融问题上比较谨慎。加之，华北发行的联银券是日系通货一员，与日圆挂钩，为了保障日本国内日圆币值稳定，必需先保证华北联银券币值稳定。一旦新货币发行，联银券的流通地位将被取代，这对于华北联银券和华中南军用票将是沉重打击，进而可能影响日圆稳定和日本本国的经济生活。所以日本对于新货币发行忌讳甚多。

汪伪政府考虑统治地区的利益，不断向日本政府提出成立中央银行（即中央储备银行）的要求；而日本考量全局的利益，为保障军用票价值，并不希望过早成立中储行，因此双方对于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在轻重缓急方面的价值判断是不一致的。日本一方面强调汪伪政府是合作伙伴，实施的是“东亚共荣圈”计划，不得不给予援助，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发行很广的军用票（遍及华中、华南）又不愿取消，反而要求汪伪政府承认。但是，对于军用票的发行，周佛海认为：“无限制的要发多少便发多少，而且发行数目中国方面完全不知，且以军票控制金融，操纵物价，人民生计受其压迫。”^[4]这从侧面反映了汪伪政府对自己无法控制的军用票发行的担忧，因其滥发不仅遭殃的是中国百姓，进而也会对汪伪政权的统治形成威胁。因而汪伪政府不得不和日本政府进行讨价还价，力求获取更多的利益。可是，日本设立傀儡政府的目的本身是为了夺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汪伪政府的要求是有一条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底线存在的。

基于殖民亚洲的野心和“以战养战”、“因区制宜”的策略，日本需要傀儡政府的合作，通过保全占领区经济来保障日本的军用物资供给，通过安抚占领区百姓来营造安定的后方，通过对占领区经济的殖民开发来造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假象，加上日本吸取“杀鸡取卵”统治策略的教训^[5]，意识到恢复金融对于治理占领区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速战速决”的战略破产后，日本政府为了利用富庶的江浙皖和上海地区的金融市场来夺取外汇，需要扶植傀儡政权来管理华中地区。此外，重庆国民政府稳固的法币制度成为日本政府在占领区进一步进行掠夺的主要障碍。为了保证日本在占领区的经济利益，在汪伪政府做出相应让步的前提下，即得到汪伪政府允许中储券和联银券按 100 比 18 的兑换率，对于军用票可以继续发行等承诺后，日本政府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汪伪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另一方，日本政府的全力支持中储券排挤法币，这也符合汪伪政府“统一币制”、“巩固政权”的政治需求。

因此，1939 年 8 月日本政府和汪伪政府进行的谈判，在 12 月 31 日订立了“日华关系”密约，双方意见在表面上达成一致。1940 年 1 月 24 日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傀儡政权代表在青岛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1940 年 5 月 3 日，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分组开始工作。所有基金准备、业务计划、发行新币、整理旧币、厘定规章、以及内部设置诸事项均经各委员填密研究，拟定方针。同时，开办行员训练所，培训基本工作人员，并根据 1937 年前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之原案，将此银行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于 1940 年 12 月 19 日汪伪政府第 31 次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正式决议设立。日本扶植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具体表现在派遣顾问和给予金融援助等方面。在日本最高经济顾问青木一男的策划下，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以达到基本上控制上海金融市场、攫取货币资源（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的目的^[6]。中储行资本拟准备一万万元，由日本从关税中按月节留六、七百万元拨给中储行（用来全购外汇，已购美汇二百余万元），其不足的资本借用华兴商业银行（借用华兴商业银

行美金五千万万元)^[7]。由日本承印中储券。日军于1942年7月和1944年8月先后由东京日本银行(日本国家银行)贷予中储行信用借款5亿日元。中储行先后在苏州、杭州、蚌埠、芜湖、扬州、无锡、镇江、宁波、汉口、广州、厦门、汕头、九江、南昌、徐州、连云港等设立分支机构。在日本东京也设立了办事机构。

至此,在日本政府的全力指导下,汪伪政府开始了“统一币制”的活动,进而在华中华南地区确立其中央银行的地位。日本利用中储行间接统治占领区,夺取了更多经济利益。

二、重庆国民政府、汪伪政府和日本政府角力上海

1937年开始的中日全面战争的决胜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经济实力,正如翁文灏所说:“国家生存之保障,在铁与血。广博之资源,皆应作铁观。众多之人力,皆应作血观。”^[8]1938年9月日军攻占汉口之后,重庆国民政府、汪伪政府和日本政府在上海就展开了这种“铁血”的金融战。

重庆国民政府、汪伪政府和日本政府三方在上海的金融战,从全局角度看,重庆国民政府是守方,汪伪政府和日本政府是攻方。从发行中储券角度看,为了动摇法币的币值和稳定中储券的币值,前者处于攻势,后者处于守势。所以汪伪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在这一阶段,对抗占主要地位。中储行的成立是汪伪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日本政府三方角斗的关键点,在中储行成立之后,三方主要是采取经济手段,在金融实力、货币制度等方面竞争。日本政府在上海地区所实施的金融战政策主要来自日本军政厅,日本大藏省等政府机关无权过问^[9]。

重庆国民政府得到英美平准基金的支持,维持着法币的币值,法币同时也成为维持重庆国民政府坚持抗日战争的金融法宝^[10]。法币不仅是合法货币,而且具有可以兑换英镑和美元的功能,成为日本进行货币战时全力打击的目标。

在中日全面战争前期(1937年7月7日-1941年12月),日本主要是投机法币来套取英镑和美元,后期(1942年1月-1945年8月15日)主要利用新货币和法币的货币差价^[11]来套取法币,利用金融战来压垮重庆国民政府,消除重庆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的经济影响。

在中储行成立之前的华兴商业银行自1939年5月16日成立,承担了日本扶植维新政府银行的职能,但是至1939年11月为止,华兴券的发行不过300万左右^[12],到1940年12月9日,也才发行了565万元,它流通不广,无法实现日本设定的目标:和法币同等地位来套取外汇,无法作为海关纳税的关金单位来换取外汇,也无法成为中国华中地区的流通货币。所以,汪伪政府以周佛海为代表提出成立“中央银行”后,1941年4月16日取消华兴商业银行的发钞权,日本表示同意。同时日本作了一定让步,军需的费用改由正金银行向中储行透支的形式,中储行为自己的利益,不给日本予取予求的权益,而是可以对日本要求的数目进行考察和核减,至少在形式上对日本军费的要求有所限制^[13]。

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对于中储行的成立严阵以待。四联总处^[14]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驻上海四银行的现钞一律逐步收回(因该四银行钞票均能购买外汇),将中国实业、兴业、通商、中南、农工、四明、垦业等八大商业银行之钞票重新发行流通市面^[15]。同时通知在沪中外银行界,中储行是非法组织,要求英美列强和驻沪银行界采取拒不承认中储券的立场,全面抵制中储券,使之无法在上海流通。四联总处用密函(电报和信函)的方式和在沦陷区的银行联络,伤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沪分行采取对抗中储行的政策。

日军进入上海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仍有分行办理业务。在中储行发行中储券后,四联总处令中交两行宣言拒收伪券、严伤沪行切实遵照办理^[16]。重庆国民政府对于中储行的成立强烈抗议,并且要求在沪的外国银行包括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不要给中储券挂牌,拒绝承认中储券为新法币。重庆国民政府虽迁移到西部的重庆,但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影响仍是至关重要的,重庆国民政府采取了充分利用政治威慑力的方式来抵制汪伪政府。

另外，还采取用恐怖手段对付日伪及与汪伪亲善的人士。汪伪采取“以牙还牙”的报复措施，双方通过在上海展开的货币战，引发了数起银行血案^[17]。这些恐怖事件的发生对于上海商民是场灾难，如1942年2月14日发生恐怖事件以来，发生地点及附近很大地区被日军封锁，20天过去了封锁没有解除，而在封锁期间仍要缴税的中国钱业和商人则要求解除封锁，以此来减少商民的损失^[18]。

“中国不是一个开金矿的事业家，而是一个卖田地过日子的破落户。”^[19]抗战开始后，工业落后、财政拮据的重庆国民政府加强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关键一环是寻求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援助。同时，英美也对中国法币进行支持，建立平准基金会，力图保证抗战时期上海外汇市场的安定。

无论重庆国民政府还是日本政府都认为重庆国民政府所以能坚持抗战，稳固法币的政策功不可没。蒋介石在1939年的讲话认为：“幸亏现在有法币制度，由此形成良好的金融经济秩序，能为长期抗战打基础。”^[20]当时任中央储备银行的日本顾问木村增太郎也有类似的话，“中国若无1935年的币制改革，亦无1937年之抗战”^[21]。但是，重庆国民政府实行在沦陷区下令商民抵制中储券，在国统区为防止法币外流，国统区各省发行省钞代替法币流通的政策，导致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重庆国民政府也不得不加大法币发行量，客观上加剧了法币的贬值。法币发行量的变化见表1。

表1 抗战以来法币发行量与通货准备金统计表

时间	中中交农四行 法币发行额 (单位:元)	发行准备金 (单位:元)	准备金占 法币发行 百分比
1937年6月底	1,407,202,334	916,518,353	65.3%
1938年6月底	1,726,997,835	1,126,811,067	65.2%
1939年6月底	2,626,929,300	1,156,088,974	48%

资料来源:《经济汇报》一九三九年第一卷第一期《抗战以来吾国之法币与通货》

由表可知，重庆国民政府抗战二年，法币发行总额约增12万万元。法币准备金也下降至48%。当然，这时法币发行量的增加，与战争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多有关，因此法币的贬值已是无法避免。

战争导致法币通货膨胀严重，各种地方货币的重新发行和流通，使上海金融进一步动荡。在日本山崎经济研究所上海分室“关于中支货币统一和华北联银券关系的报告”中指出：“北支物价不仅受中支以储备券结算的物价（或低落）所左右，同时，在整个土特产物资的收购过程中也受到以旧法币……上涨的影响，进而给维持联银券的价值造成困难。为了和中支的关系，更是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共存，我们不得不把圆元平等地分割开来。向北中支经济一体化方向而努力。”^[22]

因此，继1938年7月日本和汪伪政府联合采取法币套汇活动，破坏法币币值之后，汪伪政府认为，如不能控制法币发行权，就免不了受制于人的结局。为了在经济上摆脱重庆国民政府的控制，所以先发制人，在1940年8月间，大量收买中中交农四行所发行的法币辅币，造成货币市场缺乏辅币，然后大量推出中储券的辅币，在市场上广泛流通，开始了中储券排斥法币的行动。另外，日本和汪伪政府除了套取法币外，还在国统区和沦陷区收购法币尤其是收购法币辅币，致使这些地区包括上海地区的法币辅币几乎绝迹，以至当时出现了大小票的问题^[23]。汪伪政府乘机发行中储券辅币，从卖报童子等社会日常生活必需的小票人手，逐渐打开了中储券发行和流通的市场。

结语

1941年1月6日成立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对于汪伪政府、重庆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都产生重大的影响。从此在以法币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华中地区，法币遭到了中储券的竞争和驱逐。这是日本政府极力支援汪伪政府同重庆国民政府展

开经济战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军用票的广泛流通，日本直到 1943 年才宣布停止发行军用票，使中储券和军用票发生竞争。三方政府之间采用各种手段，相互作用，使发生在上海抗战时期的经济战异常激烈。

在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过程中，汪伪政府与日本政府的矛盾十分突出。入侵者与其扶植的傀儡政权之间的关系，实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以前那种仅简单强调两者之间一致性的研究方法，可能更多的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带有太多的预设在其中。

抗战的持久化使日本政府急需傀儡政权的倾力合作，以维持占领区侵略成果和攫取国统区后勤军用物资，因而日本政府对中储行成立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由消极对待转而积极扶植，联合汪伪政府打击重庆国民政府抗战的经济实力。日本政府的经济影响力通过对中储行成立的指导逐渐渗入占领区。军事上失利的重庆政府通过维持法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对抗日本的经济目的。

对于傀儡政权来说成立属于自己的金融机构实属难上加难，这种机构的成立实在要涉及到众多的因素，原有势力的反对、殖民者的干预，都成为成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曲折。在这一过程中，各方对自己经济利益的考量成为他们态度转向的主要原因。而所谓的“合作”，只是在双方经济利益一致后才会采取的行动。

注释

[1] 旧币指南京国民政府在 1935 年币制改革时发行的法定货币，称法币。中储券，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新货币的简称，相对于法币又名新法币。军用票，是 1937 年 11 月 5 日日本柳川兵团登陆杭州湾的小队开始发行，后来随着日军侵略中国的战线而流传很广，主要流通于华中、华南地区，目的把日本在华军费开支嫁接到中国百姓身上，1943 年日本才取消军用票。

[2] “一、启用中国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及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并酿成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之气势。二、促进杂军的怀柔归顺工作，图谋敌之战力的分化削弱。三、利用操纵反蒋系实力派，在敌方建立反蒋、反共、反战。四、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区，依靠回教徒，设立防共地带。五、谋法币的崩溃，通过取得中国的在外资金等，使中国现中央政府从财政上自溃”。

[3][10][12] 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 464 页，第 496 页，第 496 页。

[4]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8 页。

[5] 此前日本摧毁中国华北地区的金融系统后，华北地区从城市到农村一片萧条，这明显不利于日本占领区的统治，所以日本占领华北后不得不迅速在华北城市建立联合准备银行、恢复农村的信用合作社。

[6] 罗君强：《对汪伪的回忆纪实》，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65 页。

[7][22] 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海档案史料丛编，下册，[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6 页，第 97 页。

[8] 《日本侵华的经济意义》，[上海]《经济汇报》1939 年 1 月 1 日。

[9]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陆第二四二号·香港通货对策第二阴又少件》，昭和十七年一月十五日。

[11]1941年2月3日发行的中储券与法币等价流通，1942年4月9日开始中储券与法币不等价流通，法币七七折，出现货币差价，到1942年5月26日开始中储券兑换法币是一比二的兑换率。

[13]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凤凰出版社。第98页。周佛海为自己在金融上的汉奸行为辩白，认为发行中储券，是有利于中国金融、物价及民生不受其操纵，是比较好的办法。此为周佛海一面之辞，尚未找到其他人的说法。我觉得储备券的发行，与法币的不平等兑换，本身剥削民生，可是对于巩固汪伪政府的统治、稳定金融方面是有所贡献的。

[14]“四联总处”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的简称。

[15]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年），[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页。

116]上海档案馆藏：《Q55-2-1586.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秘总类》，1941年1月7日-1941年6月25日。

[17]例如，1941年3月3日，伪中储行上海分行办事员富荣炳遭枪击受伤，3月16日，伪中储行行员上海分行会计课副主任张永钢家又被暴徒入内狙击，3月21日，伪中储行上海分行调查处副主任楼侗被打死。对于重庆国民政府在上海的暗杀活动，周佛海命令上海特工人员力谋反攻，3月21日深夜，汪伪特工总部派遣特务，到中国银行职员集体宿舍和江苏农民银行宿舍，绑架中国银行职员129人，并击伤农民银行职员21人；同年3月24日，汪伪特工总部在法租界“逸园”中央银行办事处及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该行分理处，分别投放定时炸弹，炸死炸伤50余人。

[18]上海市档案馆藏：Q264-1-1290，金城银行档沪行综合类（负责人公和函），第60页。

[19]章乃器：《币制改革以后·中国经济论文集》，[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207页。

[10]蒋介石：《中国金融业的当前要务》，《抗战与建国》，[香港]民社1939年版。

[21][韩]金正贤：《论国民政府的法币价值稳定政策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

[23]林美莉：《抗战时期法币的大小票问题：通货发行与物价上涨史实的一个观察》，文中就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无法充分供应票面币值在十元以下的“小票”，人民不愿意接受票面币值超过十元以上的“大票”，拥有大票者必须折价才能兑换小票问题，产生所谓的“大小票问题”。对此问题对民众生活影响和日伪政权利用大小票供需失常的机会推广其货币。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8年6月。

[责任编辑：肖波]